

**序言：**社会记忆是传承文明、书写历史和维系共同体的动力，它对抗遗忘，可通过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呈现，亦可寓于多元记忆主体建构的“记忆之所”。社会记忆实践的过程常常充满对话、协商与争夺，从而使得“当下的”社会记忆既把“过去”或“传统”呈现于现在并指向未来，又富有情境的多元性与复杂性。这呼唤社会记忆研究不断拓展其论域，发展理论与创新方法。本刊曾在2015年第12期推出“媒体与社会记忆”专题，本期继续关注“社会记忆”的问题。黄顺铭等人关注不同的社会行动者围绕成都的洛带公园开展的记忆实践，发现有关袍哥组织与公园的记忆实践精心选择了历史记忆资源，塑造了普遍的、审美的与去政治化的过往想象。吴世文和杨国斌考察网络自传呈现的网民互联网记忆，指出网络自传是互联网历史和记忆研究不可忽视的内容，也是一种值得推广的研究方法。白红义以范长江与张季鸾两位著名报人为例，借用记忆机会结构的概念阐述他们在记者节话语中的不均等呈现机会。郭恩强通过分析刘煜生案在“九·一”记者节中的文化创伤记忆叙事，指出该案进入集体记忆是诸多社会—文化条件和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不能过于强调新闻界在此过程中的单因素作用。单凌考察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上海犹太难民纪念空间（以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为主体）的生产，指出官方主导和多种社会力量介入的空间记忆通过转译、挪用“诺亚方舟”的隐喻等方式，建构上海的城市共同体意识与“博爱”意象。这5篇文章的初稿，曾在2018年11月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首届“媒介、历史与记忆”工作坊上宣讲，后经作者修订而成。我们期望后续研究持续关注中国情境中的社会记忆实践，关注其数字转向，发掘基于中国经验与问题的社会记忆史，进而连接理论和开展比较研究，进一步回答社会记忆的复杂形成过程及其对于文化、历史与群体的意义。

## 公园作为“实践景观”： 对洛带公园（1928-2019）的个案研究

黄顺铭 陈彦宁 王周霖欣

### 摘要

一位名叫刘惠安的地方“袍哥”组织领袖于民国十七年在成都东郊洛带镇修建洛带公园。本文由“实践景观”的理论视角出发，考察洛带公园如何被生成为一道独特的物质景观，如何作为人们具身实践的舞台而发挥作用，如何影响人们对历史变迁的感知，以及古镇的旅游开发如何想象与维持公园的“信念景观”。公园的民国记忆淡

化了“袍哥时代”的政治结构与历史特征，强调建筑遗迹的历史价值与社会文化的进步成就，凸显空间中的“客家人”身份特质，进而试图形成一种普遍的、审美的、去政治化的过往想象。

### 关键词

洛带公园、记忆之所、实践景观、信念景观

### 作者简介

黄顺铭，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电子邮箱：93302007@qq.com。

陈彦宁，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电子邮箱：chenyn@126.com。

王周霖欣，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电子邮箱：wwzz710@163.com。

## Park as “Landscape of Practice”: A Case Study of the Luodai Park, 1928-2019

HUANG Shunming, CHEN Yanning, WANGZHOU Linxin

### Abstract

A leader of the “Pao Ge” organization named Liu Hui'an built up the Luodai park in Luodai Town in the east Chengdu in the 17th year of the Republican China.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landscape of practice,”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how the park becomes a material landscape, how it functions as an arena of embodied practices for the local people, how it affects their perception of historical changes, and how it was imagined and maintained as a “doxic landscape” to promote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By trying to minimize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ao Ge period,” the Luodai park emphasizes the value of certain relics in the park and the sociocultural achievements of the park, and highlight the “Hakkanese” identity engraved in the space, the memories about the park in Republican China are constructed in an attempt to form a universal, aesthetic and depoliticized imagination of the past.

### Keywords

Luodai Park, Site of memory, Landscape of practice, Doxic landscape

### Authors

Huang Shunming is a professor of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and a research fellow of the Institute for Nanjing Massacre's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Peace. Email: 93302007@qq.com.

Chen Yanning is a graduate student of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Email: chenyn@126.com.

Wang Zhoulinxin is a graduate student of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Email: wwzz710@163.com.

## 一、引言

洛带公园位于四川成都东郊洛带旅游古镇之一侧，它跨越二十世纪的历史动荡，新世纪以来又历经古镇的旅游开发与空间改造，但至今仍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原始的物质面貌，集休闲、旅游、教化、展示等多重社会功能于一体。关于公园的记忆话语，因建筑兴废、功能演变与政权演替而不断发生变化。在共和国时期，曾经作为二十世纪上半叶四川地方历史记忆中一个重要因素的秘密社会组织“袍哥”逐渐被官方所淡化，公园的记忆建构在地方政府的旅游经济开发和地域文化塑造的需求之下，指向了更具普遍的、审美性的、去政治化的“民国想象”。园中的物质要素与行动者的社会实践彼此作用，不断形塑着公园的记忆图景。

研究公共场所记忆的学术文献常将“记忆之所”（sites of memory）（Nora, 1989）的公共休闲功能和公共纪念功能视为彼此冲突和争夺的两方。例如，建于成都少城公园中的保路运动纪念碑在民国时期受公园的其他功能挤压，一度被遗忘，丧失其应有的纪念意义（Fan, 2013）；云南腾冲的国殇墓园落成后，曾被征用为民众教化与文娱的场所（刘于思，2015）；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从神圣的纪念空间转变为偏重于服务市民需求的休闲娱乐空间（方远平，唐艳春，赖慧珍，2018）。一个重要原因或许在于，这些记忆之所原本就是为了纪念某个特定历史事件而修建的。而本研究所关注的洛带公园，自建成以来，始终处于记忆建构的“未完成”状态。公园是生活场所，也是记忆场所，它记忆的是常规化（routinized）的日常生活和空间的建筑与风物。记忆的形成过程与公园空间景观的变革、记忆实践的影响紧密相连，也与公园所出现、成长与起伏的历史情境息息相关。

记忆并非某种一成不变的容器，它以动态的形式，在不同的时间点以不同的方式运作，在静态与动态的辩证关系中完成社会再生产（Olick & Robbins, 1998）。为了探讨围绕物质景观发生的历史想象和社会实践，考察景观作为物质空间和实践舞台之特性，并揭示特定的意识形态与观念如何在景观中被实践、巩固和强化，本文将引入人文地理学家提姆·克雷斯韦尔（Tim Cresswell）的“实践景观”（landscape of practice）的研究视角（Cresswell, 2003），具体探讨下列研究问题：首先，洛带公园的物质景观在近百年的时间中如何生成？其次，不同的行动者如何在洛带公园中展开

社会文化实践? 第三, 围绕洛带公园, 浮现出了怎样的“信念景观”?

## 二、记忆、景观与实践

记忆使得过去与现在之间产生了某种连续性 (Till, 2003)。人们通过对历史进行选择、处理与书写, 通过公共纪念活动与重要记忆场所, 试图彰显一个文化社群中的成员所共享的过去, 以满足当下的需要, 表达对未来的期望。关乎历史与过去的集体表达往往附着于某些物质载体之上, 或者栖身于特定的空间和景观当中。景观为人们回忆往昔提供了一种空间性的、在地性的、物质性的现实依据 (Foote & Azaryahu, 2007)。近年来, 勃兴的记忆地理学 (geography of memory) 热衷于讨论与战争、革命以及其他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的公共记忆和纪念场所 (Foote & Azaryahu, 2007)。

集体记忆研究的先驱莫里斯·哈布瓦赫 (Maurice Halbwachs) 从一开始就将“空间与集体记忆”当作一个基本问题 (Halbwachs, 1980: 128-157)。记忆总是被锚定在特定的空间之中, 通过特定形式的纪念物来表达与再现, 譬如纪念碑、历史遗迹与记忆标识 (Zelizer, 1995)。集体记忆的保存和运作总是有赖于这样或那样的载体, 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 (Pierre Nora) 谓之“记忆之所” (Nora, 1989)。记忆之所以既可以是高度抽象之物, 如作为观念的“自由、平等、博爱”, 也可以是非常具体的地理空间性的场所, 如博物馆、墓园以及宫殿。

在分析具有鲜明地理空间性的记忆之所时, 通常需要同时关注该空间的物质特性、象征意义以及于其中展开的社会实践 (诺拉, 1996/2005: 23; Cresswell, 2014)。例如,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从建馆之初就在一堵墙上精心设计了一道“遇难者300000”的物质景观, 而这一数字标识在随后三十余年的发展中又以其他几种物质形式被强化, 由此造就出一个独特的意义之网, 不断激发或容纳着各种行动者的记忆实践 (黄顺铭, 2017)。又比如, 改革开放后, 人们围绕成都少城公园中四川保路运动纪念碑而开展纪念活动, 令其成为了一种反帝反封建以及走向共和国美好新生活的精神象征 (Fan, 2013)。

与上述个案相比, 本研究的洛带公园有其独特性: 公园并非自建立伊始就成为了对当地特定历史事件的记忆之所, 而是在政权更迭、代际兴替以及旅游经济发展中才逐渐成为当地重要的记忆地标。在经年累月之中, 乡民饮茶相谈、文人作诗著文、学生纪念死士、政府维护开发等活动都不同程度地作用于景观中的物质环境, 影响着物质空间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拟采用“实践景观”视角来考察洛



带公园中的物质要素、社会实践以及二者之关系。

克雷斯韦尔在回顾地理学各分支学科以及人类学中景观研究的基础上，基于矛盾修辞逻辑提出了一个“实践景观”的概念（Cresswell, 2003）。在他看来，这个复合概念中蕴含的矛盾张力与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概念可谓异曲同工：两者都刻意将一个表达“固定性”的元素（即“景观”与“结构”）与另一个表达“流动性”的元素（即“实践”与“感觉”）相并置，希望一方面让固定性的要素不至于太稳定不变，另一方面也让流动性的元素不至于太变动不居。

克雷斯韦尔发现，二十世纪以来，文化地理学中大体上有过三种景观范式：世纪初期的景观范式强调“物质性”，认为景观是一种由自然或人类之力造就的物质产物。一旦人们在取材于“自然景观”中的物质上镌刻进能动性，便会构筑出“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七十年代的景观范式不太关注景观的物质性，亦即不太关注“在景观中看到了什么”，转而强调景观乃“一种观看之道”（a way of seeing），景观存在于观者的头脑与眼睛之中。而八十年代中期的景观范式则认为，景观是一种被编码进了特定意识形态并有助于权力结构之再生产的物质产物。他指出，过去的景观研究过于强调“视觉”的中心地位，认为景观乃供人“观看”——尤其是于高远之处鸟瞰，这意味着观者相对于景观是“局外人”。以视觉为中心来理解景观，景观最终必然沦为一种“视觉之事”，沦为一种“图像”（image）。

“实践景观”概念的提出，不仅是为了回应传统景观观失于“固定性”和“视觉性”的偏颇，更是为了回应“实践”在景观研究中的缺席状态。克雷斯韦尔指出，从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到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再到奈杰尔·斯威夫特（Nigel Thrift）的实践理论都受惠于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身体-主体”（body-subject）观。“身体-主体”观重新将人的意图性指向身体，因此“在世存有”乃一件“具身之事”（Merleau-Ponty, 1962: 110）。可见，关注实践就不能不关注人们的具身实践。具体到景观而言，外在于景观的“观看”只是具身实践的其中一种形式，单有这种视觉实践自然不够。实践的丰富性，首先在于人们动用各种身体感官来针对景观展开实践，其次在于人们动用各种感官所展开的景观实践也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大部分则是人们已经习惯成自然的日常实践。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实践经由人们的反复操演而成常规和惯习，它们围绕某些特定场所发生，遵循某些特定的时间韵律，因此仿若一场

编排好的“身体芭蕾”(body-ballet)或“场所芭蕾”(place-ballet)(Seamon, 1980: 148-165)。这些日常生活实践的发生及其循环,正是景观流动性与具身性之体现。总之,实践关乎流动性与具身性,而实践的流动性会让景观始终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克雷斯韦尔说:“我想让景观显得不那么固定不变,不那么依赖于视觉,不那么依靠权威的‘框架’,同时我也想使实践显得不那么任意漂移,而是使它更多地与那些形塑我们生活的力量相关联”(Cresswell, 2003: 277)。的确,景观并不只是视觉之产物,更是某种实践环境之产物。

从实践角度理解景观,我们应当采取“一种更加综合性的模式,不仅仅要问景观是什么或者意味着什么,更要问它做了什么,它如何作为一种文化实践而起作用。景观……并不仅仅意指或象征权力关系,它也是一种文化权力的工具”(Mitchell, 1994: 1)。在批判理论看来,景观不仅是我们的感知生活的媒介,也是“人们迷失自我的所在”,因为它是文化权力机制的实践场地,将明明由文化与社会所建构出来的结果以一种“自然化”(naturalized)的面貌来展现,并向观者发出询唤(Mitchell, 1994: 1-2)。当人们面对景观时,“会被席卷到景观当中”,其观看、走动、倾听、思考等实践也“会留下痕迹”(Shanks & Pearson, 2000: 135)。作为一种物质文化的景观,是对人们所处环境中的既有秩序的一种表征,是推动社会行动的有力保障,是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空间(Shanks & Tilley, 1987: 113),是物质、意识、行动与想法彼此发生关联进而实现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也是道德教化藉由日常实践而得以实现的地理据点。

克雷斯韦尔还指出,“场所”对于意识形态的形塑与再生产,具有与“种族”“性别”和“阶级”相等量齐观的作用。场所不单单是行动与实践的幕布或背景板,而是与日常生活实践相伴相生(Cresswell, 1996: 14-21; Cresswell, 2003),因此有必要对场所及其运行机制予以分析。他特别从布尔迪厄那里借来“信念”(doxa)概念,呼吁研究者考察“信念景观”(doxic landscape)(Cresswell, 2003: 277-280)。“信念”是日常实践的产物,意图使人们在一种前意识状态下完成对既定规则的重塑和再生产,其目的是使规则或某种观念成为人们心中不证自明、理所当然的“常识”(Bourdieu, 1977: 164)。它也是一种嵌入身体的“限度感”,令行动者在无意识状态下遵照社会偏好而行事(Cresswell, 1996: 14-21)。而“信念景观”,可被视为某种特定的历史以一种自然化的方式所表现出来的结果,也是激发或约束某种既定生活方式不断再生产的场所。它既是一种实践的产物,也是特定实践模式运作的基本条件(Cresswell, 2003)。

### 三、研究方法

本文是一个质性研究，使用多种方法收集到了丰富而扎实的经验材料。

第一，田野观察。我们于2018年1月、3-4月、9-10月以及2019年1月和5月，在洛带古镇——尤其是洛带公园——做了多轮田野观察。最初的观察主要针对公园空间的陈设、道路、苗圃、树木、水塘、建筑、人事，以及公园周边的环境。随后的田野地点主要是在公园中，与当地居民一道饮茶、乘凉、观景和闲谈，随行人走动观察他们的游览过程，观察各类行动者在公园里的日常实践。

第二，访谈。我们的访谈有半结构性的深度访谈和非正式的访谈。我们与饮茶休憩的当地居民随意攀谈，内容涉及当地人记忆中的公园历史、公园创建人刘惠安的故事、公园的变迁与现状，以及公园中的日常公共生活等。同时，我们也先后对一些参与古镇景区开发的工作人员和本地文化历史爱好者做了深度访谈，包括洛带文化站前站长李声鸿、龙泉驿区文广新和旅游局文博科科长姚云书、四川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苏东来、洛带客家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张海榕、承担公园重建规划工作的成都亚林古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亚林、洛带历史爱好者刘晓忠，以及曾经的公园茶馆和摄影部的营业者。其中，李声鸿与刘晓忠是洛带本地人。访谈内容主要涵盖公园历史变迁、公园用地规划方案等方面，与本地人的访谈还牵涉到本人及其亲友对于公园的回忆。除了对李声鸿的访谈仅有40分钟之外，其余访谈均在1.5到2.5小时之间。

第三，文献资料。本文的分析还建立在下列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一是地方志。我们翻阅了自民国以来的5版地方志，包括《（民国）简阳县志》<sup>1</sup>《简阳县志》<sup>2</sup>《成都市龙泉驿区志》<sup>3</sup>《龙泉驿区志》<sup>4</sup>，以及目前正在由洛带客家文化研究院所主持编纂的《洛带名镇志》<sup>5</sup>。二是与当地有关的其他文献资料，包括关于景点的介绍性文字、图片、新闻报道，以及各个时期的规划文书等。三是与洛带公园有关的回忆性文本，包括诗歌、散文，以及网上由民间人士所写的回忆文章等。

### 四、公园物质景观的生成

洛带镇又名“甑子场”和“镇子场”，自明清“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以降，便成为一个重要的客家人聚居地。民国时期，洛带镇隶属四川省简阳县，乃“简阳西北之重镇”（四川月报，1935），主体街场呈带状沿东南-西北延伸。

自民国十五年（1926）起，广东客家人刘惠安出任洛带镇保卫团团团长，时人谓之“刘团总”。刘惠安是一个有文化的治理者，毕业于成都法政专科学校<sup>6</sup>，另一

说是他曾求学于上海<sup>7</sup>。民国时期，四川以团练制开展地方治理。头目士绅虽经指派，但官府作用十分有限，往往仰赖地方精英主持团务，维持秩序，保境安民（王笛，2018：47）。由于洛带“从前时遭匪患”，加之民国时期的四川军阀混战，简阳掌权者更迭频仍，地方管理失控，因此士绅领袖在地方事务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在官府无法深入地方治理的时期，刘惠安的治安成效颇为卓著：“本区门户练之整齐，及办团经费之充实，均为简阳县之冠。”（四川月报，1935）

他的另一重身份是“袍哥”。袍哥即四川的哥老会，是形成于清代的秘密社会组织，初以“反清复明”的目标对抗官府。民国时期，尤其是辛亥革命后，袍哥“反清复明”的色彩渐淡，成为四川地区影响广泛的半公开组织（王笛，2018：35）。袍哥有清浑之分，刘与其组织系典型的清水袍哥，即成员在本地出任某种职务，与政府军队存在交集，与其他袍哥码头和公口组成“联合会”互相照应（赵清，1990：221）。刘惠安对洛带拥有高度自治权，参与征税与治安工作，掌握当地生杀大权，治世用重典，“以杀立威”<sup>8</sup>，只需年底上报处决人数即可<sup>9</sup>，甚至“没有此人允许，军队也不得进入街场”<sup>10</sup>，故时人谓之“刘皇帝”<sup>11</sup>。刘惠安靠着团总和袍哥的双重身份，成为民国时期洛带镇声名最显赫的地方政治领袖与社会管理者。在任期间，他曾在洛带大兴教育机构与民生项目。至民国十六年，洛带镇拥有高等小学和女子高等小学各一所<sup>12</sup>；十八年，兴办教养工厂（后改为民生工厂），让无业者务工并接受教化；二十九年，又开设了电灯公司<sup>13</sup>。

刘惠安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首倡修建洛带公园。他以募捐、摊派、罚缴等方式<sup>14</sup>，从士绅和袍哥码头募得“洋数万元”（四川月报，1935）。公园选址上场口，位于主街东边以北，模仿成都第一座公园（少城公园）而建<sup>15</sup>。建园期间，他“以工代罚”征集劳力，强使本地那些作奸犯科者参加园务，解决了农忙时节所遭遇的劳力短缺或罢工等问题。翌年，公园初步建成，占地约60亩<sup>16</sup>。入园处有一副楹联，“公产本无私，到此游观，俱是主人俱是客；园亭非易建，须知爱惜，一堆花草一堆钱”，园内西有六月茶社，东有四合院，南有女宾休息所，北有公共体育场（“楠木林”）（四川月报，1935）<sup>21</sup>，此外还有凉亭三座（园中的“峨亭”“洛亭”以及山腰上的草亭）、忠烈祠、管理用房“丁字舍”，以及曲池、流水与八角井。各处楼台亭榭大多有楹联装点<sup>17</sup>。在所有这些物质元素中，忠烈祠是一个鲜明的记忆元素。民国时期，洛带公园以这种格局基本稳定下来。一位调查者在1930年代目睹到公园之辉煌，不由赞叹：“以一乡间市场，具有如斯建设，亦不可多得也”（四川月报，1935）。

“六月茶社”，因作为盛夏之始的六月乃喝茶旺季而得名<sup>18</sup>，为七开间敞厅，两边立柱上撰有一副楹联——“尘市嚣嚣到厌烦时来暂歇；茶烟细细得清闲处且偷安”<sup>19</sup>。茶社中间是一个木构轩台，约五平方米大小，充当说书、打金钱板、唱围鼓等小型文娱表演的舞台。“女宾休息所”由从前的桑蚕商铺演变而来，后逐渐变成专供女子饮茶之处，男宾不得入内<sup>20</sup>。女茶社“坐南向北，背邻溪岸，壁砌半墙，窗垂竹帘”<sup>21</sup>，门前一颗大石榴树<sup>22</sup>，树下安放石凳。

四合院坐东向西，一楼一底，下为餐馆，上设“万有书库”，刘惠安购置“四库全书”等书籍典藏于此。忠烈祠遥对六月茶社，系二十年代末期为纪念剿匪阵亡的“节烈义士”而建，供乡民瞻仰祭奠。抗日战争时期，当地人将祠堂前的坡地辟为花圃，用“一串红”植出“抗战救国”四个大字，以纪念出川抗战的本乡将士。

“每逢花开，字如血染，即或花谢，亦如碧书。”<sup>23</sup>

园内的两座凉亭形制相仿，石砌六边形须弥式台基，置垂带式踏跺五级，施木构亭栏和飞来椅，中央设木构梯阁供人登临观景<sup>24</sup>。八角井在建园前即已存在。这种形状的水井在洛带镇还有好几处，而这口井的出众之处则在于，形貌之大超乎一般，口径达2.5米<sup>25</sup>。一条小溪在园中蜿蜒，自东北向西延伸，至西南折而向北<sup>26</sup>，它成就了一座“活水公园”。整座公园外围不设围墙，以杨柳树、香樟树作为分界标志<sup>27</sup>，令游人的进出路线具有很高的自由性。并且，公园北部本身就是一片树林，致使这一片区在“公园领地”的属性方面稍显模糊。

洛带公园的修建自然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事物，当时正值公园在中国的快速发展时期。“公园”作为一个纯粹西方的、现代的概念，其形成与西方十八、十九世纪共和政体的确立以及工业革命的出现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它通常由官方机构辟设和管理，具有休闲娱乐、教育教化、环境保育等作用（Shi，1998），譬如英国伦敦的海德公园和美国纽约的中央公园。中国虽素有园林传统，但“园林”或“花园”主要为皇家贵族和士大夫阶级服务，与公众的日常生活并不相干。直到从十九世纪中后期，公园在中国才逐渐成为一种大众日常生活中可进入、感知与体察的场所。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上海租界公园的出现（李德英，2000；熊月之，2013），到晚清上海以张园为代表的“私园”（熊月之，1998）和清末北京的皇家园林（Shi，1998）面向公众开放，再到二十世纪初年到三十年代民国当局市政改革蓬勃发展，大力推行城市建设规划，为居民开辟和兴建公共休闲娱乐场所（李德英，2000），公园这一“舶来之所”才在中国的主要城市和少量县城生根发芽，进而对大众的城市社会生活产生了普遍的影响。



洛带公园是以成都的少城公园为“模本”而修建的。到1920年代中期，少城公园中餐饮娱乐设施、体育设施、文化教育设施、卫生洗浴设施一应俱全，已是一个可满足市民综合需求的新型城市公共空间，它既改变了城市空间结构，也丰富了大众的社会文化生活，还推动了公众的民主集会、宣讲及其他政治活动（赵可，1999）。在洛带镇上模仿都市公园修建洛带公园的实践，凸显出袍哥领袖刘惠安对于现代社会和城市休闲方式的追逐和渴望。公园也以一种“公产”的形式，为乡民们带来新的生活体验。入园处的那副楹联虽未表达出对于共和政体的认可，但一种关于“公共”的社会生活理念却已然切实形成并被付诸实践了。

1949年12月，刘惠安被胡宗南任命为“川陕鄂绥靖公署反共救国军”第六纵队司令，掌握地方武装和电台<sup>28</sup>，袍哥组织与国军队伍势力的盘根错节由此可见一斑。在1950年成都解放前夕，刘惠安曾收到隶属国民党的亲戚的空投信筒，劝其远走台湾，他却以“故土难离”为由拒绝<sup>29</sup>。解放后，他曾一度转投人民政府，出任第一任镇长。不久后，当地发生“三月初三”反革命暴乱，曾经与解放军有过正面冲突、与国军余党有过秘密联络的刘惠安与其他袍哥头目一起被平叛，并最终在建国之初的西南剿匪运动中被歼灭了<sup>30</sup>。新政权将袍哥视为“蒋匪余党”，称其“依托封建力量，大量转化为土匪，在西南作最后的挣扎”（江横，1950）。于是乎，从前带有复杂的民间江湖色彩、或清或浑的“袍哥”转而变成破坏人民安定团结的“土匪”。新政权通过“清匪，反霸，镇反”<sup>31</sup>，肃清了保卫团和袍哥组织等旧势力。在解放后的档案资料中，刘惠安被定性为“作恶一生的”乡场恶霸<sup>32</sup>。

解放后，新的地方人民政府接管了洛带公园，并根据生产建设与所有制改革的需要对其加以管理。其中，主要被征用的部分是北部片区，陆陆续续被划为生产、建设、公路以及学校的用地；园内的其他亭台房舍也一概改作他用，草亭则被拆除。1958年，简阳县区公所开始复兴公园，在临近六月茶社的地方新掘水塘，种植菱藕，新建“湖心亭”<sup>33</sup>，重新造就出“三亭”并立之格局。在1960年代，地方政府将主街江西会馆中的烈士墓迁入园内，成为临时的烈士陵园<sup>34</sup>。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亭台楼阁被贬为“四旧”，惨遭损毁<sup>35</sup>。到1977年，公园面积已从60亩锐减至19亩<sup>36</sup>。同年，成都市文化局拨款修建围墙，公园的边界得以稳定下来<sup>37</sup>。1981年，公园重开茶社，1982-1983年，园内建立文化活动中心，将办公的四合院重新命名为“凝翠楼”<sup>38</sup>。在1980年代，摄影部、小卖部、餐馆、图书室、台球等服务项目也进入园内，公园开始逐渐成为当地人民照相、文娱、休憩的重要场所，同时还拟申报“区级旅游风景区”<sup>39</sup>。在文化单位的保护和管理之下，公园逐渐成

为边界明确、属性清晰的风景区。尽管公园几兴几废，其物质形貌相对于1970年代而言，并无太大差别<sup>40</sup>。

## 五、公园作为实践舞台

当生活常规、政权体制、经济结构与符号系统发生变化，既有的空间“常态”也往往会遭受质疑，进而引起身份认同、权力关系与社会实践的相应变动（Till，2003）。有时，即便是一个局部性的微小变化，也可能与宏观政治环境有着密切联系。新的政权可通过题写新的铭文、改变街道和城区的名字等方式，实现资本积累（Hoelscher & Alderman，2004），巩固新的政治秩序。譬如，国民党以“中国故土”的各类标志性地名重新命名台北街道，试图为这座城市“重绘地图”（Leitner & Kang，1999）。一个新政权除了简单地“擦除”（Connerton，2008）与旧政权有关的过去、添加新的记忆符号、转换纪念地点以勾连权力关系之外，也会通过吸收旧时代的某些意象与特征来形塑“新的”纪念物，以期确认并凸显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连续性（Till，2003）。例如，后苏联时期的俄国精英通过重新阐释象征苏联战争胜利和经济建设成果的纪念遗址，试图消除人们因对苏联政体的联想而产生的“不适感”（Forest & Johnson，2002）。总之，记忆会从当下需要出发，选择性利用过去，将过去化身于人们所创造的物质景观当中（Lowenthal，1975；Larsen，2006）；同时，遗忘也发挥着与记忆类似的作用（Lunstrum，2010），甚至可以说“记忆即遗忘”（刘于思，2015），即一个政权可以通过主动“忘记”某一特定历史的重要特征，以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维持统治秩序。

洛带公园的修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洛带镇的公共空间格局。建园以前，镇上重要聚会场所有主街上的“禹王宫”“南华宫”与“万寿宫”等三个清代会馆，分别由填川之湖广籍、粤籍与赣籍客家人所建，服务于同籍客家移民。建园以后，乡民们便有了一处新型的公共聚会场所。洛带公园的修建重构了乡民休闲与聚会的方式，使他们从原来专门服务同籍客家人的会馆走向不分来源籍的另一个“景观式的”公共生活空间，从而突破了原来以宗族或籍贯作为轴心的社会交往方式。在民国时期，公园既是当地居民休闲文娱与联络交际的重要公共场所，也是袍哥维系帮派关系和影响力、实现乡镇社会整合和管理的重要公共场所。

据本地人回忆，当时园内六月茶社的茶价非常便宜<sup>41</sup>，往来于洛带镇的许多乡民在此歇脚休息，互通消息。这种情状符合王笛对成都茶馆的解释：与堂皇的广东茶楼和上海茶馆不同，成都茶馆表现出一种“平民化”的特点（王笛，2010：30—

33)。茶社中间有一约五平方米的木构轩台，充当说书、打金钱板、唱围鼓等小型文娱表演的舞台。据载，唱得最好的是本街的“郑记围鼓”。园内的其他知名民间文娱组织还有“峨山京剧社”和“东山票友团”，外地的戏班和艺人也常来洛带镇演出，这些活动丰富了乡民的文娱生活<sup>42</sup>。位于园内南边的“女宾休息所”由从前的桑蚕商铺演变而来，逐渐变成专供女子饮茶之处，男宾不得入内<sup>43</sup>。据说，谁家的女人若因吵架而负气去了女茶社，丈夫就只能在茶社门口的石榴树下“坐冷板凳”了，等着女人出来<sup>44</sup>。二十世纪传统客家女性的地位虽不及男性（陶长江，郭凌，林瑶，2016），但是专门服务于女性的公共场所在公园里的出现，却无疑是一种值得肯定的社会进步。

公园也成为了袍哥展示帮派势力、树立道德典范、维护和确证自身权威和权力合法性的场所。据说，刘惠安在园内断事判案、处理纠纷与视察民情，边喝茶边按照自己所立规矩，就将乡亲们的纠纷官司一应“拍板”裁判了<sup>45</sup>。按照王笛的说法，袍哥作为持有声望的社会精英，常常以“吃讲茶”和“茶馆讲理”等方式，在官方司法系统之外实现社会调解（王笛，2018：116-124）。这是刘惠安向乡民们展示地方精英的权威并进行社会约束与规训的一个过程。他还将公园作为秘密组织公开活动、团结联动的平台。每年正月底二月初，他在楠木林设擂台，举办单刀会，让武林人士竞技切磋，以增进各码头公口之间的联系<sup>46</sup>。“获胜者晋封为武魁，颁发奖章奖金，披红挂绿，骑上高头大马，由鼓乐手在前敲打开路，通街游走，接受人们的祝贺。”<sup>47</sup>

为缅怀和纪念本乡英雄典范的“忠烈祠”是洛带镇一个实现教化目的的重要道德场所。英雄们功在本乡，服务于保卫团，形成地方武装，抗击山上抢匪；袍哥兄弟出川后成为抗日的重要力量之一，面对日军侵略，奋勇牺牲，谋求“中华民族的解放”<sup>48</sup>，与民族国家的共同命运紧密相连。祠堂中供奉节烈义士的神主牌位，教导乡民“忠勇正义，保家卫国”，并以楹联凝聚与昭彰英烈们的精神：“捍桑梓而持干戈奋不顾身山川突变风云色，分园林以兴祠宇修其祷祀花木都随俎豆香”<sup>49</sup>。因此剿匪与抗战的袍哥团体就成为了被地方帮会“合法化”的英雄。

当人民政府接管洛带公园以后，公园的所有权和管理权伴随新政权的社会主义建设历程几经更易。解放后，公园归洛带公社管理，1976年以前设洛带公园大集体机构，属于集体企业的性质。1977年后，公园隶属龙泉驿区文化局的保护管理范围，由镇文化站接管。在1982-83年期间，镇文化站在公园设立文化活动中心<sup>50</sup>。1988年，公园正式划归龙泉驿区博物馆管理使用<sup>51</sup>。

解放以来,面积的缩减、边界的建立、建筑用途的变更以及原有建筑的几兴几废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洛带公园的物质景观,继而影响到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具身实践与感知;当空间逐渐稳定下来,当地乡民的生活常规与惯习又不断地维持和促进着公园作为休闲和公共生活空间的再生产。有两起关键性的空间转换事件及其引起的实践活动变化,特别值得一提。

第一起空间转换事件是园内公共纪念场所的更迭。解放以后,新政府在忠烈祠南边修建烈士墓<sup>52</sup>,设圆冢安葬剿匪烈士,立石碑铭刻烈士功绩与来源籍贯,作为临时的纪念场所。最著名者是安徽当涂县指导员张翔,在建国之初的剿匪运动中牺牲<sup>53</sup>。此外,还有义勇救人牺牲的少先队员董世明<sup>54</sup>。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忠烈祠中的牌位却被清除,作为园内大集体机构的花匠们的临时宿舍,忠烈祠由此丧失了其应有(以及原有)的纪念功能。最终,忠烈祠于1990年代因建筑损毁严重而被彻底“擦除”了。

从本乡英雄到他乡英雄,从袍哥义士到红色先烈,新的纪念场所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记忆空间的在地色彩,使其超越地域的局限,服务于对新的国家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的文化认同。伴随这种纪念空间的转换,出现了新的纪念实践。每年清明节时,洛带小学和洛带中学都会组织学生到公园去扫墓。清明扫墓这一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是有组织的、常规化的纪念活动。仪式参与者并不只是学生,还有一些亲历剿匪的战士。先由战士向学生宣讲先烈们的革命事迹,随后学生集体向烈士墓宣誓与行礼。<sup>55</sup>结果,新的国家道德典范就在这一年一度有组织的地方公共纪念实践中被树立了起来。如今,当年的纪念活动成为了本地人共享的一种“成长记忆”。甚至在烈士墓迁至烈士陵园很久以后,他们仍然能明确指认当时园内墓碑的所在位置<sup>56</sup>,也清晰记得自己当年围观迁墓时看到坛子中的“解放军军装纽扣”等细节<sup>57</sup>。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们对忠烈祠却印象模糊,大多数人难以回忆起这一场所,也很少将它与园内的纪念活动相联系<sup>58</sup>。同时,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官方叙述中,作为公共纪念空间的公园遭遇了两种记忆的“危机”。一种危机是被淡化,与其他景点相比,关于忠烈祠和烈士墓的回忆难得一见。另一种危机则是纪念场所不同时期的功能分野被模糊化。譬如,在景区提供的“金牌讲解”有偿语音服务中,讲解者只谈烈士事迹,不提忠烈祠的功用,甚至将两种空间“模糊”为同一处——“现忠烈祠内,众烈士遗体已迁龙泉驿区烈士陵园”。淡化园内纪念遗址的遗/痕迹、削弱其记忆地位所带来的结果是,游客和乡民可能会将公园感知为一个更加一般性的消闲场所。



第二个事件是茶馆的关停与重开。公园内有两处茶社，这里主要围绕“六月茶社”（即“男茶社”）进行分析。在解放后的所有制改革中，民间私有茶社停开，原房舍被改造为卫生所，以满足乡镇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在“文革”时期，对私有茶社和喝茶休闲的禁令尤为严厉：“劳动最光荣，喝茶是懒汉，做做小生意、卖卖小菜更是资本主义的尾巴”<sup>59</sup>。当时，洛带唯一的茶铺是集体所有的“新新茶铺”，在公园外的场镇主街营业<sup>60</sup>。普通百姓饮茶休闲的活动空间不得不从公园和会馆等处，转移到主街上的国营茶铺。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允许私人经营茶馆，公园才在文化站的组织下整修茶房，并于1981年重开茶社<sup>61</sup>。茶社虽貌似旧颜，它勾起的生活回忆却已迥然不同。在新开茶社中，可供表演的轩台已被废弃，曾经的文娱传统也已消失，袍哥“吃讲茶”的社会风俗了无痕迹。茶社历史与所有制的变革历程息息相关，当时的茶社由“文化站”组织与经营，这是洛带本乡人对于七、八十年代洛带公园历史所共享的社会生活常识<sup>62</sup>。喝茶是乡民感知政治环境的一种重要的日常活动。茶馆这一物质空间的变迁过程，成为乡民了解、感受与理解“解放”“改革”和“运动”的一种重要空间媒介。

除忠烈祠、烈士墓与茶馆之外，公园中其他几处建筑也历经不同程度的空间变化，这些变化也影响到了当下的记忆图景。在二十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六月茶社停开后，女茶社成为乡民共同的休憩地，九十年代被先后改建为卡拉OK厅和桌球厅<sup>63</sup>，最终因年久失修坍塌而被“擦除”<sup>64</sup>；四合院中的书籍遭到损毁，被悉数捐出，峨山京剧社时期遗留的服化道具被清理<sup>65</sup>，庭院在七十年代被改为大集体机构宿舍<sup>66</sup>和当地医院家属楼<sup>67</sup>，后来建设景区时又再次改为茶馆和麻将厅；北部的公共体育场随着公园面积的缩减而消失；园内的活水系统因规划建设被切断，八角井则在修建洛带中学时被填平埋入了地下。那些或消失或失去原有功能的建筑基本上沦为了记忆的盲点。如今，公园中的大多数乡民对于“女茶社”“凝翠楼藏书库”与“楠木林”等空间元素毫无印象。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当回忆书写者和复建规划者在建构“信念景观”时，一些消失的景观（如“女茶社”和八角井）却格外受重视。

八十年代以来，公园重新成为洛带人休闲娱乐与社会交往的重要场所。每到逢场天，周围一带很多居民来洛带镇赶场，办完事会来这里喝茶休息、商谈交谊。这里也是男女相亲的地方。当地的职业媒人叫做“红爷”，他们聚在茶社相互交流婚姻信息。“每个人衣兜里都揣着几张红纸片，上面写着请托人家儿子或闺女的情况，以及所寻找对象的要求，比如家境、长相、身高、学历等。……有时候，也有



父母带着羞涩的儿女前来向某一个‘红爷’咨询或央求相亲。”<sup>68</sup>适婚男女经“红爷”介绍后，就到园内的茶社聊天相看<sup>69</sup>，若男方相中女方，就把两人的茶钱都付了；若女方没相中男方，相亲结束后会悄悄把茶钱压在杯底<sup>70</sup>。此外，公园还是以红白喜事为营生的手艺人聚集地，从厨师、阴阳先生、主持丧仪的礼宾，到写对联的先生。“由于都是本地名人，所以他们坐在茶馆里的姿态就与众不同。喝的茶是上好的‘一花’，抽的烟是烟叶特别油亮的上等叶子烟。他们一边用客家话闲聊，一边等待方圆几十里的顾客前来雇佣。”<sup>71</sup>

公园摄影部是洛带镇最具人气的照相馆。园内的假山、亭楼、几十年的杨柳树、柏树、柿子树都是经典的取景点。逢年过节，一家人来园内拍张全家福；或者是三五好友，一群年轻的同学、战友在这里合影留念，甚至在照片上写下“风华正茂”“战斗友谊春常在”等字句自勉。洛带人毛晓初是一位记者出身的摄影师，在她前不久策划的《老街坊：来自老照片里的故事》展览中，不少洛带人所捐赠的老照片是以园内亭楼为背景拍摄的。而时至今日，一些已迁居外地的洛带人仍愿意回来照相。三十多年来，洛带的个人和群体的影像记忆共享着同一张背景板<sup>72</sup>。各种各样的人情关系就这样在园中联结与凝聚，人们对于洛带的“地方感”也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日常生活实践而培养了起来。

## 六、公园作为“信念景观”

从二十一世纪初开始，成都市政府选址洛带镇，以“四川客家人聚集地”为核心特色，依托明清古街、会馆、公园等历史遗迹与资源开发旅游业。2005年，“世界客属第20届恳亲大会”在成都召开，主会场设在洛带镇，“全球20多个国家及地区，以及内地17个省区的155个代表团”出席大会<sup>73</sup>。洛带镇政府以此为契机，提出“世界的洛带，永远的客家”口号，力图使洛带成为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客家人身份空间之一。

古镇的旅游化使得洛带公园逐渐凸显出了双重属性：一是作为“局内人”的生活领地的属性，这是在公园建立以来近百年的在地实践过程中慢慢沉淀下来的；二是作为供“局外人”观览的景点属性，这是直到古镇景区旅游开发时才浮现出来的。在古镇旅游化以后，尽管它仍然是人们喝茶休闲、维系日常交际的“洛带公园”，然而它也有了一个新名字——“客家公园”，变成了一处景点。大体上，这两种属性折射出两种不同的“信念”。一是“实然”的信念，由栖居于“洛带公园”中的当地人所维系；二是“应然”的信念，即可供观览的“客家公园”由当地

有关文化管理部门所控制，并竭力“邀请”游客的参与。

在古镇旅游化以后，公园内部的格局与面貌较之于先前并无太大变化。公园首先是主要面向“局外人”的古镇景区中一处特殊的“局内人”之领地。本乡人在园内的实践与行动遵循着一套相对稳定的时空秩序，他们共同参与谱写并合奏着该空间的“韵律”（rhythm）（Lefebvre, 2004: 1）。“公园里每天都是这个样子”<sup>74</sup>，每天园中的人也有很高的重叠度。空间韵律大致是这样的：每天早晨七、八点钟，公园就开始热闹起来，东边的林子里有人帮着雇主遛鸟，西边的茶社里挤满了搓麻将、打毛工牌的男女老少，有些牌桌边上还会围一圈看客，有人手里还揣着水烟筒和烟袋子。掺茶的女师傅提着老茶壶不断走动，给各桌添添茶水，拉拉家常，而如果哪桌表示想打牌，她就拿一张方形毛毡布铺到桌上<sup>75</sup>。茶客们有基本固定的座位，也有彼此熟络甚至固定的牌友<sup>76</sup>。中午十二点左右，人们走出公园，到公园外围一圈的饭店吃午饭，这时候是公园里白天相对安静的时段。不到一个小时，人群又重聚于园内。这时也到了游客入园观览的高峰时段。由于公园与古镇并非截然分离，倘若有人想去看下午的文艺演出，他们就会去到古镇上的五凤楼广场<sup>77</sup>。下午四、五点以后，茶客们开始陆续离开，人影疏落，公园再次安静下来。第二天，一套相仿的“场所芭蕾”又会重新在园内上演。

公园为“局内人”与“局外人”提供了一个相遇的空间。很多游客一身都市打扮，有些人甚至还搭配上氢气球与花环之类的“假日装扮”，与园中本地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绝大多数游客从凤仪巷口进入公园，花上5至10分钟在园内走马观花一番。只有极少游客会认真地将公园视为一个“景点”，即便是对于这些人，公园也只是整个古镇当中一处边缘性的景点。当游客们在园内行走与游览时，基本上保持着一种稳定而连续的节奏感，极少有人刻意停顿下来仔细打量什么。其活动路线主要限于园中小径，并不轻易涉足本地人核心的饮茶棋牌区域，与“局内人”之间保持着难以逾越的距离。正是靠着这种距离感，公园作为客家人的身份展演空间才得以有效地维系。作为“局外人”，游客们对于公园的认知有别于“局内人”，也不与本地人共享园内的生活“韵律”。本地人饮茶闲坐，用客家语拉家常，玩麻将或毛工牌，这些活动构成了园中基本的生活韵律，这种韵律几乎必然会对游客们理解“客家人”这个族群提供某些或积极或消极的线索。此外，有些游客也会坐下来感受园内的休闲与热闹气氛。他们一般落座于两处：一处是与本地人茶社仅一个花圃之隔的凝翠楼茶社，另一处则是本地人茶社的外围区域和那些座位比较疏散的地方。这两处落脚点都与“局内人”之间保持着一段距离。落座于此的局外人与局内

人之间有机会产生短暂的交集，譬如掏耳朵的手艺人、卖豆花和大饼的商贩会不时来到游客中做生意。总之，游客与本地人虽同处一园，但“使用”该景观的方式却迥然有别，前者在此格格不入，后者却安适其所，而这种差别所指向的是关于“这是谁的场所”的不同信念。

有关文化管理部门作为物质景观和象征意涵的主导定义者，围绕公园陆续展开了一系列关乎公园之“信念”的实践。有些实践是基于现有的景观，或致力于改造景观，如导览标识和景区改造规划，而有些则是于公园空间之外所生产出来的话语实践，如书册编纂、引申介绍与档案资料，这种种实践以共同生产出一个富有观赏、纪念与想象价值的公园为直接目标。

其一，树立于公园入口处以及园内的导览标识牌，帮助游客建立对这个古早的乡镇公园的基本认知。

公园位于凤仪巷北，占地60亩，为民国17年（1928）时洛带袍哥舵把子刘惠安倡导地方群众和码头袍哥集资修建，是四川省最早的公署之一。园内绿树成荫，花草繁盛，茶社幽静，亭榭廊柱，木刻楹联，古风浓郁。最具特色的是园内的“女子茶社”，是过去客家妇女集中休闲品茗聊天之所。（凤仪巷入园处）  
……凌（凝）翠楼为小青瓦四合院，楼上曾是龙泉驿区第一座图书馆，曾藏有《万有文库》等书籍，峨亭（峨山）京剧社也曾在此处。（八角井街入园处）

导览词共有四处：两道门外各立一块解说牌，其中凤仪巷口的牌子已斑驳难辨；在门后墙上那一块木刻中英文导览牌中，特别提及刘惠安的“广东梅州籍客家人”身份。在整个古镇，公园成为“最后”一处明确承认刘惠安和袍哥存在的物理空间。导览词首先承认刘惠安作为公园的记忆开端者的功绩，讲述他集民资民力修建公园的过程，确证这里是最早的“公署”和“乡镇公益活动场所”的历史场址，并在承认建筑成就与社会进步应归功于入蜀客家人之后，完成了公园与整个古镇系统之间的呼应。尽管女茶社和图书馆早已无影无踪，然而导览系统仍旧将它们作为宣传核心，以彰显园林古建筑成就与社会文化进步。文化单位甚至还着重对这两处景点做了引申性的介绍，试图邀请人们去想象一个“过往的异邦”（Lowenthal, 1985: xvii）。这个过往异邦是曾经的公园，更是民国时期的整个洛带古镇。更微妙的是，鉴于所联想之景观已丧失现实的物质依据，“想象地理”才得以在这些咏赞和解释性文字中重新焕发出生命力：

最具特色和价值的是园内的“女茶社”，乃过去客家妇女集中休闲品茗聊天之所，不纳男宾。其间一副‘尘世嚣嚣到厌烦时来暂歇，茶烟细细得清闲处且偷安’的对联，正是当年客家妇女拥有与男性同等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的见证（闻一少，2015）。

时远近文人、书院学子常来光顾（凝翠楼），读经考史，阅览诗文，寻章摘句，或浅唱低吟。时而聚会一堂，谈古论今，挥毫泼墨，切磋学问。楼下及楼后各厅堂雅座，尽作食馆。特聘成都竞成园名师主厨。佳肴盛宴，味冠一方。<sup>78</sup>

这两则引申性介绍虽未以标识牌的形式出现于园区，但它们已成为权威而经典的解释，不断被直接引用或者化用到各种文章和语音解说词之中，成为人们理解公园历史价值的“共识”。在这两则引申性介绍中，不乏对民国社会的想象，为景观赋予怀旧价值，缔造出了一幅富有现代进步意义、性别平等、风雅有格的社会生活景象。这种怀旧是一种审美活动，借助于想象选择性地重构历史（赵静蓉，2005）。这种民国想象的性质与其说是政治与社会意义上，倒不如说是文化与审美意义上的：它竭力表达对过去文化氛围和进步气息的向往，却与民国洛带的地方结构、秘密组织和社会秩序之间脱离了联系，从而将公园的过去汇入到更为普遍的、审美的历史叙述之中。

其二，那些散见于不同时期的个人抒怀与回忆书写以“个体化”的视角，对整体的记忆图景做了补充。解放前，本地文人作诗著文，题刻楹联。据洛带籍国学大师王叔岷回忆，“园中悬挂父亲所撰木刻对联甚多”。他还依稀记得，茶社间内，“七碗初浮，万花齐发；层峦耸翠，飞阁流丹”<sup>79</sup>。其父王增荣留下了许多记录个人心境和咏叹园内风物的诗句，譬如“此间即是偏幽地，不必桃源可避秦”间（《仲春公园遣兴》）、“日涉园成趣，诗联句并遒。玉瓯非解渴，一涤古今愁”（《秋日偕群少公园啜茗感赋一律》）<sup>80</sup>。作家肖平回忆起少年时期跟随外公外婆穿梭于园内媒人和手艺人之间的经历，感慨系之：“这气氛是自由的、活泼的，是被移民社会长期的人情交际自然培养起来的”<sup>81</sup>。

围绕公园所产生的这些个人回忆，“镶嵌在个人从中获得身份的那些群体的故事中”（康纳顿，1989/2000：18）。它们突破时间边界，与共同的空间实体产生联结，并展现出了空间在不同时间当中的某些面向。地方文化单位将散见于不同时代的文章收集起来并汇编成册，书写者们的个体记忆“超越”其生活时代与社会身份而得以“相遇”，它们共同激荡出一种“集体声音”，也共同建构出了洛带公园这一回忆空间。通过一系列文本实践，当下的公园成为一处想象民国时期洛带镇的

历史文化、园林建筑成就以及高雅生活格调的地理基点，也成为了客家人世俗生活和民俗文化的展演舞台。

其三，官方档案资料的书写与收集是另一种关于洛带公园的重要的文本实践。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将记忆区分为“功能记忆”与“存储记忆”，其中前者根据群体需要选择性地记忆或忘却，而后者收录“与现实失去有生命力联系的东西”，意图对所有记忆进行保存和整理，为其日后重新成为功能记忆提供了可能性（阿斯曼，1999/2016：146-159）。在龙泉驿区文化局在1990年代为公园复建规划所做的文物建筑登记中，间或提及袍哥刘惠安作为公园修建者之外的其他角色，例如，他每年正月底二月初在楠木林设擂台，组织各码头兄弟与英雄比武，“赛事始终，均坐镇在场”，同时还提及他如何分配武器、组织地方保卫团共御山贼匪患以及修建忠烈祠纪念义士等故事<sup>82</sup>。然而，这些极富江湖意味的袍哥故事却极少出现在公开的导览介绍中。这些故事能否从相对封闭的档案中被“释放”出来，从存储记忆转换为功能记忆，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有关文化管理部门在建构“信念景观”过程中作何取舍。至少目前，这些故事的前景仍是晦暗不明的。

其四，古镇的旅游化还为公园带来了另一种形塑乃至重塑信念景观的实践，即对公园的规划重建与保护性改造。在古镇旅游开发之初，由于公园及其周边其他的物产权分属不同的管理部门<sup>83</sup>，也由于公园的历史渊源和旅游价值被认为远逊于清代古街与商业会馆<sup>84</sup>，因此对公园的管理、规划与开发就落后于其他景点。2007年，龙泉驿区文体局和博物局拟定新的“洛带公园保护性改造工程”计划，并委托成都亚林古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规划与开发。项目拟定规划、改造与扩建现有的洛带公园，使其成为“以洛带民国地域文化为主体的‘客家原生态文史景点’”，成为一块“浓缩中国内陆客家风情的活化石”，完善古镇在“民俗、民国、客家”三种文化面向中的布局，打造“全球唯一且最好的客家公园”<sup>85</sup>。2016年，《成都洛带公园传统建筑保护维修及环境整治工程方案》正式通过了审查<sup>86</sup>。

规划任务为对公园进行改造、扩建、维修及环境整治，主要项目包括：一是整合周边市场，将公园扩至30亩；二是本着尽可能“修旧如旧”的原则，恢复女茶社、牌坊楹联廊桥等建筑或元素；三是新掘水塘，重引活水，将八角井迁建回园内；四是整修、疏通与完善基础设施<sup>87</sup>。在这些工程的基础上，拟打造出“海外世客林健身休闲景观区、凝翠楼景观区、女子茶社景观区等七个功能分区”<sup>88</sup>。就怀旧的类型学而言，复建作为一种修复型的怀旧，“以求征服时间和以空间展现时间”（博伊姆，2002/2010：56）。设计者原本希望仿照少城公园的“紫薇阁餐



厅”，恢复凝翠楼的餐馆功能，但该建议因安全隐患而被否决了。从前发挥休闲或社会生产功能的建筑物逐渐被“圣化”为一处彰显历史价值的文化遗产。恢复“女茶社”和“楹联”，是在为民国时期川西园林建筑、社会进步与文化发展成就寻找地理上的落脚点。而迁建八角井，则是为“洛带”的命名渊源以及古镇的“三国”文化内涵（“刘备之子阿斗落玉带于镇中八角井”<sup>89</sup>）再次发明出一个可观可感的“记忆传统”（霍布斯鲍姆，兰格，1983/2004：1-17），使之更加深入地镶嵌于古镇之中。有关文化机构试图通过修复性的改造，“恢复公园的原貌，讲述公园的历史”，既“让人们能够感受到区域文化历史，同时又能够满足现代生活的娱乐需要”，也让游客欣赏和体验公园的“园林之美、古建筑之美”。对洛带公园进行修复性改造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使之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客家华人的一个记忆之所。

也有个别项目目前尚处于一种游移不定的状态，这从反面表明有关方面对于景观所持“信念”不尽一致。2005年，方案中拟建一面文化展示墙，利用围墙上的浮雕，讲述洛带民国风俗故事，绘制客家人刘惠安等人物故事图像（《洛带民国众生相》）<sup>90</sup>。可是，在2016年通过的计划中，却被改成“客家文化展示墙”，要以浮雕来讲述客家人迁移的历史故事<sup>91</sup>。同时，计划中也拟修复忠烈祠。2015年，面对“老洛带人”关于公园何时改建、如何改良与打造等问询时，龙泉驿区政府的回复依然是“修复忠烈祠”<sup>92</sup>，但在最终的图稿上，却是拟建一个规模极小的“烈士纪念碑”，旨在象征性地标记公园中曾经的烈士墓。

对于公园的改造工程尚未落实，其中的矛盾、反复与犹疑却已表现得相当显豁：是要努力忠实地铭记民国时代的古镇和公园呢，还是竭力在遵从政治话语对刘惠安的历史评价的同时，满足旅游资源开发建设经济需要呢？在公园改造规划问题上的波动，源于记忆社群对于共享的地方历史存在很大的认知冲突。一方面，刘惠安身为本乡一位有文化的昔日领袖，有公认的治安和管理功绩，在动荡时期保卫乡土安泰，因而在洛带人中至今仍享有相当积极的声誉<sup>93</sup>。但另一方面，由于刘惠安及其袍哥团体与新政权之间的矛盾，是当下政治情境中的污点人物，被官方历史叙事标签化为“土匪”，这使得昭彰其功绩抑或为其正名都相当困难。因此，对于洛带公园的修复性改造，一种折衷而现实的选择是：当不得不提及刘惠安与公园修建之间的历史联系时，刻意淡化其袍哥身份，仅强调其作为客家人的领袖身份，并通过“烈士纪念碑”所树立的英雄群像，进一步改变公园的意义重心，刻意淡化洛带镇民国时期的“独立王国”色彩。总之，地方政府试图刻意将洛带公园打造成一个面向大众、铭记民国文化成就、凸显客家人身份，以及展现原生态民俗传统的记

忆之所，但目前尚未就其“信念”达成高度一致的理解。

## 七、结论与讨论

与战争纪念公园、历史博物馆等大型记忆之所相比，本文所考察的洛带公园只是一个微型的记忆之所。不过，微型空间并不意味着它没有研究价值。有学者在总结“记忆地理学”时提到，记忆研究常聚焦于某些特定的时段与地点，如美国南北战争、“一战”与“二战”、犹太人大屠杀等，结果令那些在地的、微小的纪念空间容易被记忆研究者们“遗忘”（Foote & Azaryahu, 2007），而这些微小的历史和记忆同样值得研究者去关注。正如安德森等人所言，“我们并不通过个案研究去揭示全世界，而是经由这一个案唤起某个特定的世界”（Anderson, Domosh, Pile & Thrift, 2002）。

在人民政府掌管四川以前，由于军阀混战，政权轮替，官府难以深入地方进行有效的管理，因此袍哥得以在地方社会和国家政权之间占据一席独特之地，成为形塑并维持基层地方社会秩序的一个关键组织。袍哥作为一种地方秘密社会组织，成员来源相当复杂：既有盗匪与恶霸，也有侠盗和绿林好汉；既有人成为军阀或附庸于国民党，也有人置身于党派斗争之外成为中立者，还有人成为了参与新政权的一种积极力量。在解放以后，川蜀多地的袍哥在西南剿匪运动中被相继肃清，并被整体定性为恶劣的反动团体，袍哥集体面临着与本研究刘惠安相似的关于历史角色转换的身份危机。在共和国时期，历史编纂者如何看待和书写地方秘密社会组织成员们的故事？新政权又如何处理民国时期四川的历史叙事方式？通过分析洛带公园中的景观及其实践，也许能为回答这些宏大的问题提供一种在地的、空间的研究视角。

本研究采用“实践景观”的视角，对洛带公园近百年的物质空间的生成、实践舞台中的具身实践与感知，以及记忆行动者们所建构的“信念景观”做了一种过程化与整体性的分析。洛带公园是袍哥领袖刘惠安于1928年整合士绅、码头资产与民间劳动力而修建的一座乡镇公园，它以一时罕见的公共休闲空间规模与园林建筑成就而远近闻名。后来，随着成都解放、袍哥被新政权肃清以及社会主义建设运动的发展，公园的物质空间与景观发生了重要转换，进而直接影响了民众的生活常规和社会文化实践。

新世纪以来，地方政府以湖广填四川运动中的“四川客家聚居地”作为核心的记忆卖点，试图努力将洛带打造为一个旅游古镇。在此过程中，洛带公园也伴随一

系列的文本实践和空间规划实践而成为了一个记忆民国历史、留住客家民俗传统的地理据点。对于公园“信念景观”的建构是一个精心选择历史记忆资源的过程：一方面，它淡化了袍哥组织与公园之间的联系，忽略了民国时期洛带镇特殊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强调园林古建筑之美以及民国社会文化的进步成就，激发人们对民国时期洛带的怀旧想象；另一方面，它也凸显与公园有关的行动者的客家人身份，试图将公园形塑为一个与全球客家人相关联的“原生态”的身份空间，以期让“活的记忆”在具体可感的空间和社会实践中不断延续。

克雷斯韦尔认为，“视觉中心”的地理研究容易把目光局限在那些宏伟的“精英式”的景观，而人文地理学研究者所要应对的挑战正是如何将研究推及那些日常化的、具身的、实践的场所。这些地方从来不是可以轻易被框架和解读的，因为它们始终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因此，对它们的研究要兼顾场所的时间性与空间性，流动性与固定性，要揭示具身实践所立足的情境、框架以及秩序（Cresswell, 2003）。本文所考察的洛带公园正是这样的一个场所。未来的“记忆之所”研究可以继续去研究那些看似稀松平常的场所，例如城市里的某个超市，或一条关键的交通路线，这类空间中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体化记忆”（康纳顿，1989/2000：90-132）和“空间韵律”。

公园的复建工程目前尚仍处于一种进行时态之中。当未来复建完成以后，公园作为乡民休闲空间的性质与它作为旅游空间的观光性质之间将会产生何种竞争关系呢？当园内坑洼的泥地与石板路被平坦干净的路面所取代，很多原有的物质痕迹被抹掉，这会对人们的具身感知与身体实践产生何种影响呢？

此外，我们在田野过程中发现，对于刘惠安的民间书写与官方的主导叙事之间存在极大的冲突。在围绕洛带而创作的电视剧《滚滚血脉》和长篇小说《甑子场》<sup>94</sup>中，以刘惠安为原型的角色“刘闻安”和“安”都是由于他人的恨妒、构陷以及个人的情爱纷争，才在时代的乱局中才成为了反动者。文艺作品将刘惠安的反动归咎于偶然的外在的因素，从而试图将其参与暴乱的行为合理化和非罪化。文艺作品的真实性固然不能与文史资料相提并论，它却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当地人的认知、情感与记忆状况。因此，当下如何建构关于地方秘密社会组织“袍哥”的历史记忆，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责任编辑：杨名宜）

#### 注释 [Notes]

1. 林志茂（1992）。《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二十七册〈民国简阳县志〉）》。

成都：巴蜀书社。

2. 四川省简阳县志编纂委员会（1996）。《简阳县志》。成都：成都巴蜀书社。
3. 龙泉驿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5）。《成都市龙泉驿区志》。成都：成都出版社。
4. 成都市龙泉驿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13）。《成都市龙泉驿区志：1989-2005》。北京：北京方志出版社。
5. 龙泉驿区洛带镇政府主编，四川客家研究中心承编《洛带名镇志》（初稿），洛带镇客家文化研究工作人员提供。
6. 龙泉驿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5）。《成都市龙泉驿区志》。成都：成都出版社。
7. 2018年4月10日对苏东来的访谈。
8. 龙泉驿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5）。《成都市龙泉驿区志》。成都：成都出版社。
9. 2018年4月17日对李声鸿的访谈。
10. 魏平（2016）。悦读甑子场。载洛带客家文化研究院（主编），《凝聚的乡愁：洛带客家文化研究院编研文集》（第71-87页）。成都：洛带客家文化研究院内部交流资料。
11. 龙泉驿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5）。《成都市龙泉驿区志》（第646页）。成都：成都出版社。
12. 林志茂（1992）。《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二十七册〈民国简阳县志〉）》（卷二十）。成都：巴蜀书社。
13. 龙泉驿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5）。《成都市龙泉驿区志》。成都：成都出版社。
14. 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公社（1981）。《“洛带公园”地名卡片》。
15. 2018年3月23日上午的田野笔记；2018年4月4日对张海熔的访谈；2018年4月10日对苏东来的访谈。
16. 另有一说认为公园初始占地18亩，后来不断扩张至60亩。
17. 姚云书，薛登（2001）。客家公园记兴废。《龙泉驿区文史资料（第八辑）客家文化专辑》（第159-165页）。成都市文化局内部刊物。
18. 成都市龙泉驿区博物馆所整理的公园档案资料。
19. 姚云书，薛登（2001）。客家公园记兴废。《龙泉驿区文史资料（第八辑）客家文化专辑》（第159-165页）。成都市文化局内部刊物。
20. 2018年9月25日对姚云书的访谈。
21. 姚云书，薛登（2001）。客家公园记兴废。《龙泉驿区文史资料（第八辑）客家文化专辑》（第159-165页）。成都市文化局内部刊物。
22. 2018年4月17日对李声鸿的访谈；又有一说是大柳树（2018年9月25对姚云书的访谈）。
23. 姚云书，薛登（2001）。客家公园记兴废。《龙泉驿区文史资料（第八辑）客家文化专辑》（第159-165页）。成都市文化局内部刊物。
24. 姚云书，薛登（2001）。客家公园记兴废。《龙泉驿区文史资料（第八辑）客家文化专

- 辑》（第159-165页）。成都市文化局内部刊物。
25. 2018年10月14日对李亚林的访谈。
  26. 姚云书，薛登（2001）。客家公园记兴废。《龙泉驿区文史资料（第八辑）客家文化专辑》（第159-165页）。成都市文化局内部刊物。
  27. 老洛带人（2014）。《旧时洛带公园的楹联》。检索于<http://tieba.baidu.com/p/3345651658?pid=58749346728&cid=0#58749346728>。
  28. 龙泉驿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5）。《成都市龙泉驿区志》（第646页）。成都：成都出版社。
  29. 老洛带人（2014）。《浅谈洛带的“三月初三暴动”》，检索于<http://tieba.baidu.com/p/3359368515?pid=59083976078&cid=#59083976078>。
  30. 龙泉驿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5）。《成都市龙泉驿区志》（第555页）。成都：成都出版社。
  31. 龙泉驿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5）。《成都市龙泉驿区志》（第672页）。成都：成都出版社。
  32. 龙泉驿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5）。《成都市龙泉驿区志》（第646页）。成都：成都出版社。
  33. 姚云书，薛登（2001）。客家公园记兴废。《龙泉驿区文史资料（第八辑）客家文化专辑》（第159-165页）。成都市文化局内部刊物。
  34. 2018年9月25日对姚云书的访谈。
  35. 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1987前）。《小园林——洛带公园》。
  36. 姚云书，薛登（2001）。客家公园记兴废。《龙泉驿区文史资料（第八辑）客家文化专辑》（第159-165页）。成都市文化局内部刊物。
  37. 成都市龙泉驿区博物馆（2005年10月17日）。《洛带公园整治、管理、经营发展工作方案》。
  38. 姚云书，薛登（2001）。客家公园记兴废。《龙泉驿区文史资料（第八辑）客家文化专辑》（第159-165页）。成都市文化局内部刊物。
  39. 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1987前）。《小园林——洛带公园》。
  40. 2019年1月24日对刘晓忠的访谈。
  41. 2018年4月17日对李声鸿的访谈。
  42. 成都市龙泉驿区博物馆所整理的公园档案资料。
  43. 2018年9月25日对姚云书的访谈。
  44. 2018年4月17日对李声鸿的访谈。
  45. 2018年4月10日对苏东来的访谈；2019年5月4日对90年代茶馆老板郭卫东的访谈。
  46. 2018年9月25日对姚云书的访谈。



47. 成都市龙泉驿区博物馆所整理的公园档案资料。
48. 成都市龙泉驿区博物馆所整理的公园档案资料。
49. 姚云书, 薛登(2001)。客家公园记兴废。《龙泉驿区文史资料(第八辑)客家文化专辑》(第159-165页)。成都市文化局内部刊物。
50. 姚云书, 薛登(2001)。客家公园记兴废。《龙泉驿区文史资料(第八辑)客家文化专辑》(第159-165页)。成都市文化局内部刊物。
51. 成都市龙泉驿区博物馆(2005年10月17日)。《洛带公园整治、管理、经营发展工作方案》。
52. 老洛带人(2015)。《洛带“土皇帝”刘惠安的家在洛带老街的具体地点》, 检索于<http://tieba.baidu.com/p/3794663363?pid=69106714843&cid=0#69106714843>。
53. 龙泉驿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5)。《成都市龙泉驿区志》(第651页)。成都: 成都出版社。
54. 龙泉驿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5)。《成都市龙泉驿区志》(第648页)。成都: 成都出版社。
55. 2019年1月24日对刘晓忠的访谈。
56. 2018年4月6日下午的田野笔记。
57. 老洛带人(2015)。《洛带“土皇帝”刘惠安的家在洛带老街的具体地点》, 检索于<http://tieba.baidu.com/p/3794663363?pid=69106714843&cid=0#69106714843>。
58. 2018年4月6日下午的田野笔记。
59. 2018年3月23日上午的田野笔记。
60. 老洛带人(2014)。《真实的“洛带新新茶铺旅馆”》, 检索于<http://tieba.baidu.com/p/3495621599?pid=62304065929&cid=#62304065929>。
61. 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公社(1981)。《“洛带公园”地名卡片》。
62. 2018年4月4日下午的田野笔记。
63. 老洛带人(2014)。《我记忆中的洛带公园客家女子茶社》检索于<http://tieba.baidu.com/p/3241313290?pid=56197022079&cid=0#56197022079>。
64. 2018年9月25日对姚云书的访谈。
65. 成都市龙泉驿区博物馆所整理的公园档案资料。
66. 2018年9月25日对姚云书的访谈。
67. 2019年1月24日对刘晓忠的访谈。
68. 肖平(2016)。《一个叫“洛带”的地方》。载洛带客家文化研究院(主编), 《凝聚的乡愁: 洛带客家文化研究院编研文集》(第31-39页), 洛带客家文化研究院内部交流资料。
69. 2018年4月17日对李声鸿的访谈。

70. 2018年4月4日对张海熔的访谈。
71. 肖平（2016）。《一个叫“洛带”的地方》。载洛带客家文化研究院（主编），《凝聚的乡愁：洛带客家文化研究院编研文集》（第31-39页），洛带客家文化研究院内部交流资料。
72. 2019年5月8日对公园摄影部田姓老板的访谈。
73. 新华社（2015）。《回顾：世界客属第20届恳亲大会》，检索于<http://gx.people.com.cn/n/2015/0107/c368759-23475913.html>。
74. 2018年4月4日下午的田野笔记。
75. 2019年5月3日上午的田野笔记。
76. 2019年5月4日上午的田野笔记。
77. 2018年3月23日下午的田野笔记。
78. 姚云书，薛登（2001）。客家公园记兴废。《龙泉驿区文史资料（第八辑）客家文化专辑》（第159-165页）。成都市文化局内部刊物。
79. 王叔岷（2016）。《王叔岷作品》。载洛带客家文化研究院（主编），《凝聚的乡愁：洛带客家文化研究院编研文集》（第26-27页），洛带客家文化研究院内部交流资料。
80. 王增荣（2016）。《王增荣诗文》。载洛带客家文化研究院（主编），《凝聚的乡愁：洛带客家文化研究院编研文集》（第20-25页），洛带客家文化研究院内部交流资料。
81. 肖平（2016）。《一个叫“洛带”的地方》。载洛带客家文化研究院（主编），《凝聚的乡愁：洛带客家文化研究院编研文集》（第31-39页），洛带客家文化研究院内部交流资料。
82. 成都市龙泉驿区博物馆所整理的公园档案资料。
83. 2018年9月25日对姚云书的访谈；2019年1月24日对刘晓忠的访谈。
84. 2018年4月10日对苏东来的访谈。
85. 成都市龙泉驿区文体局，龙泉驿区博物馆（2007）。《洛带公园项目建设方案》。成都：龙泉驿区文广新局内部资料。
86. 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政府（2016）。“成都洛带公园传统建筑保护维修及环境整治工程”通过区规委会审查，检索于[http://www.longquanyi.gov.cn/lqyqzfmh wz\\_gb/c123117/2016-04/20/content\\_fe26cb3d593d44baafb36a619425b904.shtml](http://www.longquanyi.gov.cn/lqyqzfmh wz_gb/c123117/2016-04/20/content_fe26cb3d593d44baafb36a619425b904.shtml)。
87. 成都市龙泉驿区文体局，龙泉驿区博物馆（2007年10月）。《洛带公园项目建设方案》。成都市龙泉驿区文广新局内部资料；2018年10月14日对李亚林的访谈。
88. 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政府（2015）。洛带公园蝶变“复兴”，检索于[http://www.longquanyi.gov.cn/lqyqzfmh wz\\_gb/c123113/2015-12/11/content\\_e412204d565644efb01d13e7a914deda.shtml](http://www.longquanyi.gov.cn/lqyqzfmh wz_gb/c123113/2015-12/11/content_e412204d565644efb01d13e7a914deda.shtml)。
89. 洛带客家文化研究院（主编）。《凝聚的乡愁：洛带客家文化研究院编研文集》。成

都：洛带客家文化研究院内部交流资料。

90. 成都市龙泉驿区文体局，龙泉驿区博物馆（2007年10月）。《洛带公园项目建设方案》。成都：龙泉驿区文广新局内部资料。
91. 2018年10月14日对李亚林的访谈。
92. 老洛带人（2015）。《我对改造洛带公园片区的原帖及洛带政府的回复》，检索于<http://tieba.baidu.com/p/3667735991?pid=66295161689&cid=0#66295161689>。
93. 2018年4月17日对李声鸿的访谈。“其实刘惠安这个人没有好坏，我们当地人还是很喜欢他的。”2018年4月6日我们在公园中与三位喝茶的乡民交谈，他们说：“历史书上说他‘十恶不赦’，那个你不要相信。”
94. 成都凸凹（2014）。《甑子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阿莱达·阿斯曼（1999/2016）。《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保罗·康纳顿（1989/2000）。《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成都市龙泉驿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13）。《成都市龙泉驿区志：1989-2005》。北京：北京方志出版社。
- 方远平，唐艳春，赖慧珍（2018）。从公共纪念空间到公共休闲空间：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的空间生产。《热带地理》，（5），617-628。
- 黄顺铭（2017）。以数字标识“记忆之所”——对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个案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8），15-37。
- 霍布斯鲍姆，兰格（1983/2004）。《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 江横（1950年10月13日）。开辟了农村改革的道路——记西南军民剿匪的胜利。《人民日报》，第二版。
- 李德英（2000）。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会生活——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例。《城市史研究》，（Z2），127-153。
- 林志茂（1992）。《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二十七册〈民国简阳县志〉）》。成都：巴蜀书社。
- 刘于思（2015）。从腾冲忠烈祠到国殇墓园：战争记忆的空间争夺与权力博弈。《探索与争鸣》，（7），115-119。
- 龙泉驿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5）。《成都市龙泉驿区志》。成都：成都出版社。
- 龙泉驿区洛带镇政府主编（未出版）。四川客家研究中心承编《洛带名镇志》（初稿），洛

- 带镇客家文化研究工作人员提供。
- 皮埃尔·诺拉（主编）（1996/2015）。《记忆之场》（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四川省简阳县志编纂文员会（1996）。《简阳县志》。成都：成都巴蜀书社。
- 四川月报（1935）。产业：简阳镇子场调查：附表。《四川月报》，（6），118-126。
- 斯维特兰娜·博伊姆（2002/2010）。《怀旧的未来》（杨德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 陶长江，郭凌，林瑶（2016）。旅游发展下客家妇女的地位变迁研究——成都龙泉洛带古镇的个案调查。《旅游学刊》，（10），94-104。
- 王笛（2010）。《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王笛（2018）。《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闻一少（2009）。洛带古镇，传说中的真实。《商业文化》，（3），32-36。
- 熊月之（1998）。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学术月刊》，（8），73-81。
- 熊月之（2013）。近代上海公园与社会生活。《社会科学》，（5），129-139。
- 赵静蓉（2005）。想象的文化记忆——论怀旧的审美心理。《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54-57。
- 赵可（1999）。少城公园的辟设与近代成都。《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38-41。
- 赵清（1990）。《袍哥与土匪》。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Anderson, K., Domosh, M., Pile, S., & Thrift, N. (2002). A rough guide. In Anderson, K., Domosh, M., Pile, S., & Thrift, N. (Eds.). *Handbook of Cultural Geography* (pp.1-35). London, UK: Sage.
- Bourdieu, P. (1977). *Out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esswell, T. (1996). *In Place/Out of Place: Geography, Ideology and Transgression*.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Cresswell, T. (2003). Landscape and the obliteration of practice. In K. Anderson, M. Domosh, S. Pile & N. Thrift (Eds.). *Handbook of Cultural Geography* (pp.269-281). London, UK: Sage.
- Cresswell, T. (2014). Place. In R. Lee, et al.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Human Geography* (pp.3-21). Los Angeles, CA: Sage.
- Connerton, P. (2008). Seven types of forgetting. *Memory Studies*, 1(1), 59-71.
- Fan, Y. (2013). Space, landscape, and memory.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47(1), 6-28.
- Foote, K. E., & Azaryahu, M. (2007). Toward a geography of memory: Geographical dimensions of public memory and commemo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 Military Sociology*, 35(1), 125-144.
- Forest, B., & Johnson, J. (2002). Unraveling the threads of history: Soviet-era monuments and

- post-Soviet national identity in Moscow.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92(3), 524-547.
- Halbwachs, M.(1980). *The Collective Memory*. New York, NY: Harper Colophon books.
- Hoelscher, S., & Alderman, D. H. (2004). Memory and place: Geographies of a critical relationship.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5(3), 347-355.
- Larsen, S. (2006). The future's past: Politics of time and territory among Dakelh first nations in British Columbia. *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 Human Geography*, 88(3), 311-321.
- Lefebvre, H.(2004). *Rhythmanalysis: Space, Time, and Everyday Life*. London, UK: Continuum.
- Leitner, H., & Kang, P. (1999). Contested urban landscapes of nationalism: The case of Taipei. *Ecumene*, 6(2), 214-233.
- Lowenthal, D. (1975). Past Time, Present Place: Landscape and Memory. *Geographical Review*, 65(1), 1-36.
- Lowenthal, D. (1985).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Cambridg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unstrum, E. (2010). Reconstructing history, grounding claims to space: History, memory, and displacement in the Great Limpopo Transfrontier Park. *South African Geographical Journal*, 92(2), 129-143.
- Mitchell, W. J. T. (ed.). (1994). *Landscape and Power*.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erleau-Ponty, M. (1962). *The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London,UK: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Nora, P. (1989).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 *Representations*, (26), 7-24.
- Olick, J. K., & Robbins, J. (1998). Social memory studies: From “collective memory” to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mnemonic practi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1), 105-140.
- Seamon, D. (1980) .Body-subject, time-space routines, and place-ballets. In A. Buttimer & D. Seamon,(Eds.) *The Human Experience of Space and Place*(pp.148-65). London,UK: Croom Helm
- Shanks, M., & Tilley, C. (1987). *Social Theory and Archaeology*. Oxford,UK: Polity.
- Shanks, M., & Pearson, M. (2000). *Theatre/Archaeology*. London,UK: Routledge.
- Shi, M. (1998). From imperial gardens to public parks: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pac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eijing. *Modern China*, 24(3), 219-254.
- Till, K. E. (2003). Places of memory. In J. Agnew, K. Mitchell & G. Ó Tuathail, (Eds.). *A Companion to Political Geography* (pp. 289-301). Malden, MA: Blackwell.
- Zelizer, B. (1995). Reading the past against the grain: The shape of memory stud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2(2), 214-239.